

胡适精品集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胡

胡適



主編 / 胡明

適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适精品集 3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主编 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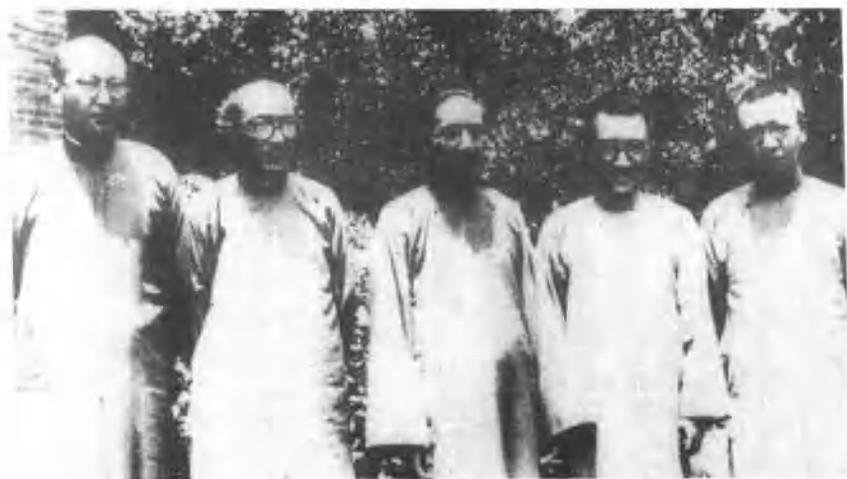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BBR 03 / 24



胡适一家的“全家福”（左为长子胡祖望，右为次子胡思杜，中坐者为胡夫人江冬秀）。



中国公学校长时期的胡适（左四）与（左起）高一涵、
马君武、蔡元培、丁毅音（1929年）。

為真理而尋求真理
科學的精神 不是教用，不是求知，是純粹「無所為」的尋求知識，
是為知識而求知識。這是一點——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科學
精神——在當時是不容易使大家了解。當時人對於「科學」
的見解多不先承認科學是最有實用的知識，即如
狄青，在他的心目中，科學的用途是破除一切迷信，
把人類從黑暗裏解放出來，引上光明的世界。至於一
般人崇拜科學為富國強兵的根源，更不用說了。其實
科學史達史上，真正創造科學的許多開山大師都並非
是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為知識而尋求知識的工
作者。英國詩人白朗寧 (Robert Browning) 有一首著

胡适手迹。

目 录

《胡适文存》二集序·····	(1)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3)
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	(19)
王莽	
——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20)
记李觏的学说	
——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28)
费经虞与费密	
——清学的两个先驱者·····	(48)
读《楚辞》·····	(90)
一、屈原是谁?·····	(90)
二、《楚辞》是什么·····	(93)
三、《楚辞》的注家·····	(94)
四、《楚辞》的文学价值·····	(95)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97)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08)
附录一：《清华周刊》记者来书·····	(120)
附录二：答书·····	(122)
附录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	(123)
梁任公《墨经校释》序·····	(153)

附录一：梁任公先生来书	(159)
附录二：答书	(163)
论墨学	(167)
《章实斋年谱》自序	(176)
《淮南鸿烈集解》序	(180)
《科学与人生观》序	(187)
附录一：陈独秀先生序	(206)
附录二：答陈独秀先生	(213)
附录三：答适之(独秀)	(216)
孙行者与张君勱	(221)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25)
附录一：梁漱溟先生第一次来书	(245)
附录二：答书	(245)
附录三：第二次来书	(247)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48)
附录：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	(329)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331)
一、引论	(331)
二、新的意象主义	(335)
三、尼采	(338)
四、演化论的哲学	(339)
五、实验主义	(348)
六、晚近的两个支流	(364)
七、五十年的政治哲学的趋势	(376)

《胡适文存》二集序

《文存》的第一集，是十年十一月结集的。三年以来，又积下了五十万字的杂文。亚东图书馆里的朋友们帮我編集起来，成为《文存》第二集。汪原放先生特为此事远道跑来北京，住在我家里逼着我编定目录；章希吕、余昌之两先生担任校对：这都是我应该道谢的。

我本想分作四卷，第一二卷为讲学之文，第三卷为论政治之文，第四卷为杂文。但因为文字的长短，每册的厚薄，竟不能严格地拘守这个区分。有几篇稍长的讲学文字，如《崔述的年谱》，如《戴东原的哲学》，因未完篇，故不曾收入。因此，卷一与卷四不免有截长补短，互相移动的痕迹。

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勉强编入的。《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

卷二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两篇，原是为《申报》五十年纪念册做的；《申报》馆另出有单行

本。《申报》馆许我重印的好意是我很感谢的。

这一集里也收有几篇三年前的旧作，也有一两篇是不曾发表过的。《费经虞与费密》一篇，是用旧稿《记费密的学说》，从头改作，比旧稿增多不止十倍了。

《文存》第一集出版时，我曾说：

我自己现在回看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只有这两点可以减少我良心上的惭愧。

我现在拿这两点来审查这第二集，觉得还不至于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所以我还用这两句话来介绍这几册文字给我的读者罢。

十三·九·二十三 胡适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我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

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

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

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

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

这三百年来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

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古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工。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越古越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解

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

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章学诚，一七三八至一八〇〇年），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

近日学者风气，微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

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

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它，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它，把它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者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

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 一、扩大研究的范围。
- 二、注意系统的整理。
- 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段玉裁曾说：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